

现代杂文的历史、现实与未来

——《2019 中国最佳杂文》序⁽¹⁾

王侃 鲁艳

以五四新文学为起点的中国新文学已然百年。某种程度上讲,现代杂文是新文学殊具异趣的品类,也是极为重要的五四遗产。值此百年之际,着手进行这样一项整理、编选工作,感慨别具。然而,每年面对浩浩汤汤又经纬万端的杂文海洋,一种“文体之难”的深切感受总会呈现于案前:从体裁或语言上看,诸多杂文作品可以归入散文这一范畴;而从题材或内容来看,诸多社论、文摘甚或游记,亦颇具杂文光彩。此种困惑不惟发生于今日,在百年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亦有迹可寻,无论是围绕鲁迅的杂文自觉意识之争,还是充斥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杂文/小品文之辩,似乎皆在昭示着:现代杂文仍缺乏一种明确的文体边界。如何定义作为现代文体的杂文,如何理解现代杂文在百年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意义,是我们每一年在遴选过程中都不能回避的问题。而对于现代杂文概念的梳理与重审,需要我们追溯历史,重返现场,将现代杂文放入中国现代文学的谱系之中去勘探与理解。

鲁迅说:“其实‘杂文’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,是‘古已有之’的,凡有文章,倘若分类,都有类可归,如果编年,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,不管文体,各种都夹在一处,于是成了‘杂’。”(《且介亭杂文·序言》)可见,杂文的源头,虽然比百年中国现代文学更为久远,但在确立现代意义的杂文文体概念之前,杂文并无独立自觉的文体意识,更多只作为一种归类方法,填充了大量无所分类的文章篇什。现代杂文的概念,基本诞生于五四时期,若是将历史落实到具体细微处,大抵还是鲁迅。就其作为一种文体的使命而言,按照鲁迅的话说,“况且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,作者的任务,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,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,是感应的神经,是攻守的手足”。(《且介亭杂文·序言》)和新文学的其他文体一样,现代杂文也是被自己的历史使命所确立的一种文体。相比于其他文体,杂文似乎更具现实性,有着更为强烈而直接的现实观照与现世关怀。面对瞬息万变的时代社会,杂文需迅速敏捷地给以直接精准的刻画。现代杂文所涵盖的内容上至国计,下至民生,无所

不包,无所不论,显示着一种现代的写实精神与普世的文学旨归。与此同时,杂文显然比其他文体更具战斗性。杂文须不惮与坚固的社会结构及稳定的文明机制展开直接交锋,以匕首以投枪,兀自杀出一条言路。如果说自晚清文学革新开始的新文学传统具备某种“先锋性”,则其中尤以现代杂文,彰显出了当仁不让的领先时代的先锋品格。

可以说,杂文作为一种现代文体,其文体意识正是其现代意识。现代杂文文体意识的确定,展示出了现代杂文创作中脱离古典文学传统的反叛因子,与包含现代意味的新质成分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,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轫初期,现代杂文的诞生,其现代性特质体现出了与西方现代性谱系所不同的源头与演变。一方面,新文学承接自晚清文学革新所开始的关于理想中国的想象,并借助现代杂文这一文类,完成了一种新的言说。另一方面,尽管现代杂文显示出开天辟地的新兴气象,却仍于骨骼血脉中保有一种延续的诗教传统,一份“文以载道”的文化理想。此种文体特质与时代思潮的矛盾错位,虽然直接影响了后来现代杂文文体意识的明晰确立,却意外释放出了该一文类所特有的文学阐释力,赋予了其别样的审美品格与文化精神:一方面,杂文“反抗绝望”,它无惧直视“淋漓鲜血”或“惨淡人生”,无畏向往“无尽的远方”与“无数的人”,义无反顾喊出时代之声;另一方面,杂文又“拒绝忘却”,在不断地“走异路,逃异地”中频频回首,穿越家国民族的历史隧洞,追问时代个人的所来之处。

总之,现代杂文,以其传统性与现代性(乃至后现代性)的多重交织,探索出了一种更为适应时代新变的文体可能。而此种为不同时代所兼容的暧昧流动的文体意识,在连续复杂多元的时代运动中,逐渐获得了其现代文学史的合法地位,归并于一个现代中国的故事,并纳入属于中国的现代性谱系之中。

百年现代文学行至今日,我们所面对的依然是一个宏大与碎片共存,集中与多元并进的时空状态。在此重要的时间节点,杂文的作用不言而喻。而我们每

一年编选年度最佳杂文的意义,也恰在此处。每年此时,当我们面对浩浩万端的杂文海洋之时,也似在百年现代文学的版图上持续地探索行进。杂文与我们,连同汇入了这一整段的历史洪流之中。

一

杂文的现代品格,首先体现于一种对于现实世界的强烈关注,一种贴近地面的观察与正面强攻的书写。此种或匕首或投枪的抨击怒吼之声,较为直截切近我们理想的杂文样态:它不惮直接撕开蠹虫侵蚀的社会病体,完成手术刀般的精准治疗。因是之故,在每年遴选最佳杂文之际,我们都坚持以文章的现实取向作为首要的选择标准。直面现实,笑骂歌哭,一任自由。而一种真之境界,亦由此诞生。

薛冰的《中国的传统节日与节俗,从来就处于变化之中》以传统节日的时代新变为切入点,所讨论的是中国当代社会的常备之题:传统与现代的碰撞。文章梳理了传统节日的形成与流变,肯定了其中所蕴含的先民智慧与美好愿望。然而文章并未片面地立足过去,或执着鼓吹传统一维,而是从更为中和圆融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,“节俗当从时代,是历史的规律,也是现实的要求”。另有任然的《被“996”围困的年轻人像是定好闹钟的机器》。文章选取的话题是时下热议的“996”工作制。任然从法理与人情的不同角度,对这一制度展开质询,梳理了这一制度遭遇反弹的诸多原因,点明这一制度背后的隐患,并提出了相应的改善建议。此种直面现实的檄文还有很多,比如卜玉英的《什么时候,我们可以不这样马不停蹄?》、陈庆贵的《娱乐生态如何水至清无“毒”鱼?》、卫建民的《人文地理的喜与忧》、潘真的《抄袭越被宽容,原创就越萎缩》,等等。

当然,每一段时间都会出现一些较为集中的热点话题。在此次遴选过程中,我们也发现,不少杂文佳作都会围绕一些共同话题展开。这其中,科技显然是当代中国的重要议题,本次辑录的诸多杂文中,便不乏针对此一议题的相关讨论。詹湛的《“App格子”里的人与事》从物质的“方格化”引申到了现代人逐渐被“方格化”的时间与生命。这种为科技所规训的生活,尽管体现着种种文明的进步与发展,却也无时无刻不在压抑着主体的情感与自由。值得肯定的是,詹湛并非简单地否认科技进步的价值,而是透过现象反思本质,考察科技背后的人的作用,显示出一种更为深刻的思考。类似的还有毕舸的《“原谅宝”,技术噱

头下的作恶》。文章从一则关于手机应用的恶性案件说起,所探讨的是借助技术所放大的人性之恶。而这种恶的收束,或许不在于限制技术发展,而是需要借助技术以外的法律政策与道德伦理的力量去应对。当然,关于科技,也并非全然负面新闻,仍存在较为积极乐观的看法。比如严锋的《科幻是一种希望》。文章从年初火爆的科幻电影《流浪地球》谈起,简略爬梳了“科幻”在中国的历史,并明确点出科幻之于当代中国的意义,即“科幻是一种希望”。另有宋诗婷的《我们的爱和欲望会消逝吗》从一种较为新颖的角度,大胆预言科技进步为当代婚恋观所赋予的更多可能性。此外,还有张田勘的《可控的人工智能才有未来》,凌河的《科学家的“红地毯”该在哪里》,殷骏的《社会发展中的温情》等文章,皆由科技这一原点出发,讨论时代圆周所可能涉及的方方面面。

另一共同话题看似轻松一些,那就是“大妈”现象。吴启钱的《大妈,你的名字应该叫优雅》从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说起,联系到近来甚嚣尘上的“大妈”话题,将“中国妇女”与“中国大妈”两种不同形象进行对比,最后期望一种更为优雅更为健康的中国妇女形象。无独有偶,另有不少杂文作者对“大妈”话题发表了看法。王钟的《“无声广场舞”让人看到文明的柔韧性》从另一个侧面对“大妈”展开了评述。文章同样是从一则社会新闻开始,一条“无声广场舞”的视频,显示出大妈们的某种“优雅”品质,反拨了吴氏文章的批判之意。更为独到的是,王钟的指出了所谓“大妈”现象背后更为深刻的社会因素,而其解决办法似乎不能只围绕一个社会群体而展开,需要全社会更为广泛更为深化的通力合作。李继勇的《“大妈”的丝巾》从大妈们的一方丝巾说起,将大妈们还原到了真实的生活情境之中,可谓更好地读解了大妈们的所思所想。文中一句“读懂‘大妈’,才能更好地读懂行进中的中国”,以小见大,堪为真知灼见,一时境界大开。不同的说者探讨同一个问题,难免带有各种不同的立场乃至偏至,往往容易造成各执一词、众声喧哗的困局。然而换一个角度看,汇聚各种声音,却可以为我们接近问题的核心与本质,提供更多可能。

二

直面现实,并非仅仅停留于现实表层,或曰偏执于现实一端。在每年的杂文佳作中,总是不乏文章在书写现实时,以历史作为方法,对现实展开旁敲侧击的突

围。在今年编选的最佳杂文中,同样有不少文章选择向历史纵深处挺进,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寻求智慧,以为现实获得启示。这些文章同样出色。

汪强的《朱墨相近,何色?》是一篇说理性强的好文。文章自一句古话“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”始,将这一句话演绎出某种极致,并进而提出了一个背反之论:过分夸大“近”的意义,难道可以抵消近朱者或者近墨者的主观行为吗?汪强引用了历史上的岳飞、包公与海瑞的例子,所证明的是,即便在这样的忠臣良将周围,也并非全然都是可堪重用的栋梁之材。由此,汪强联系现实的贪腐案件提出终极诘问,“他们是近了黑,近了坏人,才变黑变坏的,那在变前呢”?文章开篇设疑,层层推进,嵌套历史素材,最终实现对现实的别样反思。山谷的《“一笑”是怎么变成“三笑”的》将“唐伯虎一笑姻缘”的爱情传说与当代爱情故事穿插对比,一方面阐述了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对于不同时代婚恋观念的影响,另一方面肯定了某种古今不变且代代相传的婚恋本质。文章文笔纵横,妙趣横生。介子平的《有人不愿去罗马》是一篇引经据典的好文,从钗黛之争谈到人人殊异,正如“有人就出生在罗马,有人不愿去罗马”。而这种“你体会不出他的苦,他读不懂你的愁”的局面恰恰是构成世界丰富多元的原因,毕竟“叙述困境的存在,恰恰丰富了叙述的层次”。也正是感怀于这种孤独无声的境界,所有的相遇相知显得更为珍贵。胡展奋的《让面子飞一会儿》同样援引了诸多历史逸事与文化典故。从《汉书》的“便面”到魏晋南北朝的“手不释扇”,从《清明上河图》的“黑袍男”到民国时期的“破帽遮颜过闹市”,所谓的“面子”文化自古至今代代延续,而一段“便面”野史也孕育于其中,所谓“让面子飞一会儿”,短暂地“屏蔽”一番人情社会,实是古已有之的智慧。类似的文章还有陈晓兰的《过境,“可疑”的访客》、陈世旭的《误读及其他》、郭文斌的《就像干旱的土地渴求雨水》,等等。此类文章反求诸历史,纵横捭阖,文笔恣肆,叙事说理,才气斐然。

三

在每一年的杂文创作中,还有相当一部分文章着眼于时代中的个人,并从宏大的时代背景与个人的生命历程两个向度,对自我展开剖析。剖析自我,并非如今独创的杂文手段,而是自现代杂文开始就已经具备的手法。从鲁迅开始,也会有“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

审问者,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”(《集外集·〈穷人〉小引》)的感叹。而这种勇于自剖的杂文手法,显示出杂文作者自身更为强烈直接的主体意识。正是在这种时代与个人共振的反思与互文中,包含有一份更为深沉厚重的思想性。

过传忠的《从电子货币谈起》着眼于日常生活,从科技所引发的一桩尴尬事例说起。先是几番真情实感的“痛诉”,表达“科技发展一日千里”所带来的种种弊端,紧接着还是承认“首先得怪自己”,毕竟“人工智能的日子就要来到了,就要跟机器人打交道了”,时代潮流浩浩汤汤,与之共舞或者随波沉沦,在科技之外,还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发挥作用。马衣的《〈地久天长〉比〈渴望〉进步了吗》将刚刚斩获柏林电影节最高荣誉的华语片《地久天长》与20世纪风靡一时的国产电视剧《渴望》做了对比,借着其中延续的“好女人”形象反诘追问:《地久天长》比《渴望》进步了吗?答案或许是否定的。然而在种种变与不变之间,仍有一种穿越时空并引起广泛共鸣的抒情之情。作者马衣在文章最后袒露了自己的全片泪点,并结合了实际的生活经历,表达出一种对于平淡真实又具有永恒意味的生活的期盼与“渴望”。普布扎西的《山沟里的弟弟》所选取的素材来自其个人生活经历。继承家业放羊与走出山沟求学,曾是摆在“我”与弟弟面前的两难选择。弟弟选择了前者,“我”选择了后者。不同的选择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。普布扎西站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回望过去的岁月,曾经所有的激烈情绪都变得似有若无,只化为一句颇具哲理的感慨,“人真是奇怪的动物,你必须通过一段段轮回与磨难,像幼小的鲑鱼,游历完世界,返回原来那条小溪,才能产出那堆卵”,况味无限。此种来源于作者真实经历的人生感怀,烙印着最为鲜活生动的人生体验,虽不似其他文章壮怀慷慨,却以一种朴素蕴藉的方式讲明白了最为深刻的道理,兀自有一股打动人心的力量。谢冕的《因为大地养育了我们——我之节约观》同样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入文,强调了一种在时代变迁的风云变幻中始终坚守的节约观念。此种不为时代所改变的朴素习惯,不仅砥砺磨炼于清贫困苦的旧时岁月,更是源于一份人生在世感念天地的敬畏之心。感恩大自然的馈赠,感佩劳动者的辛苦,此种心情不随时代的变迁而转移。此外,还有杨杰的《我不爱猫但我敢说》、江丹的《除了“哈哈”,我们还能说点什么》、唐小兵的《我的“文学梦”》等文章,亦是从自我的剖析与表达出发,将杂文的现实精神

抑或战斗品格融入自己的写作生命之中,凝练为自身的创作准则与人生信条。

四

尽管杂文的创作有其形而上的载道理想,却也仍需一种审美形式的承载,方能实现真正有效的言说。对于杂文而言,其独特的审美形式,正在于文体的短小精悍。杂文的动人之处,便是在一种有限的文体篇幅内包蕴尽可能巨大的阐释能量。这也喻示了杂文这一文类所具备的新的写作可能。自鲁迅处,便已经开始了关于杂文的文体实验。从题材内容来说,杂文尽可以包含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天文、地理等诸多方面;从文体界限来说,杂文又可以包含小说、寓言、诗、散文乃至戏剧等诸多文体特质。在历年的编选中,便有不少杂文作者尝试着做杂文的文体实验。今年亦不例外。

陈晓兰的《过境,“可疑”的访客》中,从如今的跨国位移的烦琐程序说起,回溯历史追寻此种“海关文化”的最初源头,从欧美海关文化的差异谈到了霍桑《红字》的发现,从民国时期出游欧美的游记引申到了整段中国近代史,所涉内容涵盖历史、科技、政治、文学、地理、哲学等诸多学科,而这种兼容并蓄的文化视野注定了文章高屋建瓴的不俗格局。文末起笔“21世纪”,表明文章的笔触不惟指向过去与现在,亦包含一种面向未来的超越性思考。类似的还有姜鸣的《让老城镇更加舒适宁静》、唐吟方的《美食、方便面及其他》、捉刀人的《再见了,武侠》等文章,皆是有感于现实事例,援引各学科知识,不拘一格地表达了所思所想与喜忧爱憎。

此外,也有从艺术形式上尝试文体实验的杂文文章。比如刘诚龙的《才艺做减法》便是其中一例。文章说的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,即“专学则精”。为了说明这一道理,作者布置了一个极为精巧的局面。文章伊始,先是一则颇具寓言色彩的故事,讲的是“大师”与访者之间的一段对话。十项全能的“大师”显然不是真正的大师。真正的大师是谁呢?紧接着,下文道出

几则有史可循的历史故事。通过王鸣盛、姚鼐等人的文人逸事阐明才艺与实学之间的辩证关系。然后又宕开一笔,联系现实情况,结合中小学素质教育的战况,最终落脚于当代,给予世人警示,所谓“才艺做减法”。文章不同于一般的杂文做法,古今纵横,虚实相生,融寓言故事、历史传说、现实新闻与杂感议论于一体,有纵横捭阖、兼容并蓄的野心,显示出杂文创作的某种形式可能。

值得一提的是,现代杂文的时代新变,不仅发生于文本内部,更发生在文学的外部场域。杂文,甫一开始便是知识分子的言说,然而如今这一身份的庙堂属性似乎也在逐渐淡去,继之而起的趋势是作者身份的多元化与大众化。在今年遴选的诸多杂文背后,真正执着于杂文事业堪称杂文家的作者并非多数。在这百位杂文作者中,有学界巨擘或高校教授,亦有政经社科等各行各业的专事人才。他们的杂文中不乏引经据典、大开大合的文采之作,亦有感念生活、以情动人的诚意小品。此种从庙堂走向江湖的迁徙,或许意味着,现代杂文的概念绝不能陷入一种本质主义的误区,它将在历史、现实与未来的漫长时间轴中不断跋涉,融入一个行进中的现代中国。从这点出发,我们的回顾、整理与展望,将更具意义。

2019年10月10日于恕园

注释: -----

(1)王侃主编:《2019中国最佳杂文》,辽宁人民出版社,2020年版。

(作者单位: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)

(责任编辑:张涛)